

试论明代吴中志怪小说的盛兴

徐 慧

提 要 明代吴中志怪小说在明中期的盛兴昭示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的文体态貌及接受史呈现出小说文体在明代嬗变的过程,即由子、史部附属地位到说部独立成熟的发展过程。志怪盛兴是明初文归台阁至中期文权下移后,文人对诗文主流文体“按经受礼”束缚的挣脱;是文人于经义、文章之外的一种有效的才志伸展和建志留名的方式,亦是明中期特殊时代背景下世风和士人心态的真实反映。

关键词 志怪小说 小说文体 文权下移

明代所编类书汗牛充栋,不计其数,如陆貽孙编《烟霞小说》二十二卷,删取稗官杂记,凡十二种。沈节甫编《纪录汇编》二百一十六卷,采嘉靖以前诸家杂记、文士馀谈、志怪小说之类书籍一百一十九种。另高鸣凤编《今献汇言》二十八卷,收三十九种子部著述。李栻编《历代小史》一百零五卷,收一百零六种,陈继儒编《宝颜堂秘籍》六集,收二百二十五种,陶宗仪辑《说郛》一百二十卷等等,这些类书均收有明吴中文人所著志怪类著述。从明人所辑类书之富可见出明人著述尤其是子史部志怪杂著之多,志怪撰述于明中期的盛兴昭示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以下对其略作探讨。

一 明代小说文体的嬗变

志怪小说虽可溯源至《齐谐》,然却一直处在子史之夹缝中生存,文体功能或为劝诫或为练史笔,因其内容的卑猥庸杂、诡诞不经,总难登上大雅之堂,更遑论文体的独立发展。直至明中期,志怪作品仍兼及正统诗文和杂著的特征,从志怪作品的自序亦可看出,此时子部、说部著述的独立价值还不够明确,如祝氏对于《志怪录》的撰述和流传的自信还是缘于《夷坚志》所开的先例。更确切地说,此时俗文学的文体功能还处在待开掘中,正由附属向独立过渡。试以祝允明为例来说明,吴中文人中,祝允明的思想和撰述是系统性、整体性最强的一位。但从总体来看,其知识及撰述仍然呈现出杂化的特征,他曾书《夷坚志》,王世贞亦称:“京兆任诞好怪,与景卢臭味合,宜其尔也,比之待诏杜阳春风,斯下矣。”^①其子史杂著所记的大量神鬼怪妖和奇闻轶事实为志怪猎奇,从知识学角度来看,确实多荒诞不经、委妄不羁之谈,甚至不乏淫言媒语。然其自序和多处论说文字却反复强调“语怪”实为“语常”、“意在传信”,以“备正史之余”。《祝子罪知录》更是不吝数千言为

^① [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续稿》卷163《祝京兆书夷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鬼神之实有”而辩护,以此为其大量神鬼怪妖故事的记述作理论铺垫。祝氏虽然意识到志怪作品“恍语惚说,夺目警耳,又吾侪之所喜谈而乐闻之者”^①和资谈助、广异闻的娱乐性质,却也要硬将趋避劝惩的道德功能的价值标签贴上,或者将其往传信裨史的史传体上强拉,如其《野记》的撰述就俨然被归为史笔:“金匱石室之藏,弟拾诸司,供报漫漶者录焉尔,王相谓皇朝史良不可信,而余闻杨生与陆生论史,窃矣,当代秽陋鄙最。孔氏曰:礼失求之野,则夫探纂缀辑不有赖于其人乎?……而所采跖往往取诸信哉,其备史官之放失也。”^②其志怪的叙述法和对故事来源的交代都意在表示其作品的写实性,整个撰述表现出从史到子部、说部即从史传体散文到小说传奇过渡的文体特征,好像非但如此,无以保证其“合法”性和传世的可能性。小说于史部的寄生性由来已久,不少作家甚至以写小说练史笔,如洪迈著《夷坚志》,“今行者五十一卷,盖病其烦芜,删之,则误之甚矣。陈振孙讥迈为谬用其心,其说颇正。陈栎勤有《堂随录》,则谓迈欲修国史,借此练习,其笔似乎曲为之词,然其中诗词之类往往可资采录,而遗闻琐事亦多足为劝戒,非尽无益于人心者,小说一家历来著录,亦何必拘于方隅,独为迈书责欤?”^③志怪之作或为练史笔,或可资诗词,或为劝诫,或因历来即有而作,尤难见出其独立价值。

以下试举明初中晚各期志怪论来略窥这一文体在小说接受史上嬗变的历程。

上表所列略以时间为序,选取了明前、中、后各期颇具代表性的文人关于稗官志怪类作品的言论,严格来说,这些言论都存在言说者身份和言说语境所带来的主观性和特殊性,而无法准确、客观代表明代文人的普遍看法,需要一一具体化分析,但上表所列仍然显示出这样一种直观性:即宏观整体来看,明中期文坛对志怪类作品的文体性质、态貌、功能、价值等认识所呈现出的模糊性和过渡性。众所周知,在整个文学发展史上,以小说、传奇为主的俗文学成为明清文学的代表,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于文学史的巅峰,成为各擅一代的翘楚。然而对于明代志怪类作品在文论史上接受和认可的进程勾勒,却能明显看到,在明中期吴中地区杂学盛兴的背景下,这一文体种类在诗文等雅文学文体的夹缝之中缓慢崛起和雅俗文学相互吸收共进的过程,以及传统的文人创作主体在雅俗文体之间的挣扎和游移之状。

二 明代吴中志怪盛兴的原因

吴中文士对志怪撰述的热衷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对于传统诗文主流文体“按经受礼”束缚的逆动和挣脱。这种挣脱得力于文权下移而致的创作主体的变动,及由此而来的对于书写内容的更新。吴中城市市民阶层的兴起和对于文化活动的参与改变了传统读者群体和单一的主流文化格局。各式各样的作家身份不可能也不愿意再苦心孤诣地去深究诗文创作法,其非儒、非士的身份也无须再承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观被吴中多有的超然、孤傲、自惬而怡然自得的艺术式人生方式所消解。抄书、藏书、撰书等不过是其博雅尚趣的生活所追求的一种实现方式。因此,吴中文人的撰述在形式上呈现出一种知识拼贴、补缀的文体概貌,内容

① [明]毛文烨:《野记原序》,见祝允明《野记》。

②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44,第1229页。

③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42,第1213页。

作 者	志怪论举隅	论述阐说	时段
金 幼 孜, 建 文 己 卯 (1399) 举人。	若经、史、诸子、天文、地理、医药、卜筮、稗官、小说之类, 名虽不同而总谓之志怪, 然而经以载道, 史以记事, 至于百家之书, 人亦莫不资之以用焉。予尝观夫古人藏书之多, 至于汗牛充栋, 则凡于此又岂有一之不备哉? 《金文靖集·廉泉书舍记》	作者对于百家之书价值的认识还在模糊和含混的“资之以用”、备之无妨的概念中。	前期
方孝孺, 字希直, 宁海人, 官至文学博士。	然语怪神之事, 一以理胜之, 足以解流俗之弊, 又载当时人品, 而具评其事, 非按经受礼, 不敢略于中臆之说, 故至今传而不废也。《逊志斋集·读风俗通义》	作者认为语怪之书传而不废的秘诀在于“至理之言与天地并存”, 而非语怪内容本身。	前期
何乔新, 字廷秀, 江西广昌人, 景泰甲戌 (1454) 进士。	志怪者, 既笔之于书, 好怪者, 又深信其说。嗟夫! 自古岂有以妖术而成功者哉? 使果有其术, 卫霍英卫必用之矣, 此可决知其妄也。《椒邱文集·以郭京为成忠郎选六甲兵以御金》	在对兵家以妖术为兵法以取成功的批判中表现出对志怪作者记述假幻而惑众的咎责。	前期
王 鏊, 字济之, 吴县人, 成化乙未 (1475) 进士。	虽稗官小说、街谈巷议, 经于耳而彻于心, 每广座中持论梗梗, 若悬河霏屑, 听者皆竦而莫测其端。及得所著《蓬轩类纪》(鏊友黄漳著), 凡若干卷, 上自国家勋德, 下及闾阎委巷、方技滑稽、灾祥神怪, 可喜可愕, 罔不具焉。乃知其学有自也, 中间所纪, 虽若不能无猥琐, 或涉怪异, 然皆得之耳目之所接, 父老之所传, 缙绅之所述, 非无征也。况崇正黜邪之意, 亦往往寓乎其间, 他日观民风者采之, 安知国史不有取乎? 或曰所载多吴事, 正可以补郡乘之缺。《震泽集·题蓬轩类纪》	王鏊态度呈现出典刑的过渡性: 一, 可喜可愕之小说内容能引起听者浓厚兴趣。二, 小说之记载亦对作者有博学之要求。三, 委琐怪异之内容仍然要有所征。四, 其价值仍被归为补正史之缺。	中期
顾华玉, 字华玉, 吴县人, 弘治丙辰 (1496) 进士。	晴峰早布雪迎人, 归路仍飘雨湿尘。地主莫言乘暇日, 山灵真为借佳辰。穷高一览乾坤小, 志怪初惊耳目新。信道宣尼登泰岳, 吴门白马望皆真。《凭几集·往来道中漫兴》	对于志怪“初惊耳目新”的文体特征开始有了新的认识。	中期
陆 深, 字子渊, 号俨山, 弘治乙丑 (1505) 进士。	志怪者则有祖台, 搜神者则有干宝、刘义庆之幽明, 刘敬叔之异苑, 皆谓之杂记。其所论神仙之道, 幽冥之事, 若失服食炼气, 或可以益寿延年, 福善祸淫, 聊取诸劝善惩恶, 苟谈怪异务述妖邪, 斯义何取焉? 《俨山外集》卷二十四《史通会要上·品流第三》	对于志怪的文体功能仍在劝善惩恶和“斯义何取?”的质疑中。	中期
王廷陈, 字稚钦, 黄冈人, 正德丁丑 (1517) 进士。	仙客芝田傍白云, 偶遗鹤驭到人群。酒酣射覆多奇中, 歌罢谈玄总异闻。仗剑向幽驱鬼物, 焚香当昼下神君。人间妙术浑难尽, 欲续齐谐志怪文。《梦泽集·席上赠方士》	“欲续齐谐志怪文”表达出对于志怪类文体的接受和认可。	中期
皇甫湜, 字子安, 长洲人, 嘉靖壬辰 (1532) 进士。	呜呼! 予观往籍所存百氏杂家, 至于街谈巷语、怪诞恍惚之说见重于世, 充斥市肆, 而传乃泯没, 此无他, 儒者贪冒无耻, 奔走营利, 世风日靡, 夫何有于是书之存亡也, 况阐扬先志, 岂徒存古文于千载之下, 为士林之奇玩而已哉! 《皇甫少玄集·华阳兄编采高士传序》	这一叙述从反面反映出恍惚之说见重于世, 而文人对于该类作品的评价和认识所表现出的反复和参差之见。	后期
王立道, 字懋中, 无锡人, 嘉靖乙未 (1535) 进士。	有江湖逸士、缙绅先生相与撮摆老之浮谈, 驾孔墨之遗评, 左挥尘、右操觚, 扬眉扼腕, 鼓吻风生, 九流杂沓, 百家纵横, 纤谲微眇, 夸诩纷纭, 《齐谐》、《夷坚》之志, 岐阳邹峰之文, 探奇猎古, 语傀搜神, 谈天炙毂, 轶衍陵髡, 方期闻之, 而卷舌夷甫, 慨然以失声, 此真谈说之乐也, 子岂有取于是乎? 主人曰清谈成习, 晋以陵夷, 尤而效之, 吾不为也, 愿言其余。《具茨集·泉释》	《齐谐》、《夷坚》、《语傀》、《搜神》成为清谈之内容, 也成为谈说之乐, 由此可见当时小说志怪普及之风尚。	后期

续表

作 者	志怪论举隅	论述阐说	时段
胡应麟,字符瑞,兰溪人,万历丙子(1576)举人。	洪景卢《夷坚志》……遍询诸方弗获,……癸未入都,忽王参戎思延语及云:余某岁憩一民家,睹敝簏中是书钞本存焉,前后湮灭,亟取补缀装潢之,今尚完帙也。余剧喜趣,假录之,……余持归,竟夕不能寐,篝灯披读,……而此编以荒唐璚缀尚巍然四分之一,非藏书家至快极愉哉?因亟题其后,俟异日校而梓之。《少室山房集·读夷坚志五则》	从胡氏对《夷坚志》搜录过程的记述来看,对于志怪的喜好已不仅仅为藏书家所专享,篝灯披读的阅读享受亦不亚于喜获珍本的愉快。	后期
	学问之道非一为之者,往往困于资之难兼而日之弗暇给,于是或以经学名,或以史学名,或以典章经制名,或以百家小说名,而学问之途复析而为四。《少室山房集·策一首》	小说与经学、史学、典章经制并列成为学问之途、成名之途。	后期
汤显祖,号若士(海若),临川人,万历辛丑(1601)进士。	然则稗官小说奚害于经传子史,游戏墨华又奚害于涵养性情邪?……曷尝以调笑损气节,奢乐堕儒行,任诞妨贤达哉?……《虞初志》一书,罗唐人传记百十家,中略引沈约十数则,皆奇僻荒诞,若灭若没,可喜可愕之事,读之使人心开神释,口张眉舞。虽雄高不如《史》《汉》,简澹不如《世说》,而宛孺流丽,洵小说家之珍珠船也。其述飞迁盗侠则曼倩之滑稽,志佳冶窃窈则季长之绛纱,一切花妖木魅、牛鬼蛇神则曼卿之野饮,意有所荡激,语有所托归,律之,风雅之罪人,彼固欢然不辞矣。使咄咄读古而不知此味,即日垂衣执笏,陈宝列俎,终是三馆画手,一堂木偶,何所讨真趣哉?《虞初志·点校虞初志序》	汤显祖驳斥“小说有害于经传子史、有害于涵养性情”之见,认为志怪无妨于儒行、贤达。将奇僻荒诞之小说的娱乐功能独立列出,并与《史》、《汉》比较,标榜出小说涤荡心胸之观感和真趣之价值。	后期

上无所不包,带有杂学的性质。其中尤以趣、奇、怪为尚的奇闻轶事、神鬼妖怪故事和地方耆老故遗、人物传记居多。这些内容自然越出了诗文所能表达、抒发的范围,一些新兴的知识类型还有待新的归类和统筹。从尊体的角度来说,将这些极力挣脱诗文束缚的畅所欲言式的创作再勉强揉进传统文体内也不太可能,杂学著作应运而生。究其原因,政治衰微、文章衰飒,借志怪小说留名建志是士人、文人挣脱束缚、去彼取此的重要因素。自《春秋》、马班叙史以来,官司其职,国史图籍无不整齐公正,所谓“礼失求之野”,“国史兹以还,官丧其职,王版图籍散乱,而家各有作,东京犹可指数,降至李唐而后,丛谈不可殚已。岂非以上绝其道,而下骋其说哉?”^①唐会昌后,文章衰飒、文风衰微,才力豪劲之士均转而用心于滑稽俳笑之类,以托其永传不废,所以唐志怪传奇一时兴盛,段成式《酉阳杂俎》即是其一。文人无以建志,毫无寄托,谋求一种新的书写形式以求建志是时势使然,加之从传统诗文制作与小说流传情况来看,后者优于前者,制作泯灭,借小说以窥作者之才气、文风者大有人在。志怪小说虽不如删《诗》《书》、制礼乐来得恢宏,然从传统立言不朽的角度出发,亦可作为才志伸展和不朽之事业了。

这一点还可以明黄省曾著《西洋朝贡典录》为例说明,《西》三卷纪西洋诸国朝贡之事,“凡道里远近、风俗美恶、物产器用之殊,语衣服之异,靡不详载”^②,可谓“奇书”^③。

①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104《读夷坚志五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明]祝允明:《怀星堂集》卷25《西洋朝贡典录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清]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卷78,第679页。

然黄子以“高谭五经,富眩千轴”之才,何以“役于裔荒恢奇之形,而甘似于《齐谐》志怪之见也哉?”^①从祝允明《西洋朝贡典录序》可知,实由明中期古文写作在科举时文的挤压之下难伸拳脚,满腹才学的志士文人在场屋举业的磨折中遭受严重耗损和阻滞,并被排除在用世建功的体制之外,退避之下,文章、文学又面临着不尽如人意的场景和状态:“斯今之世,作者寂寥,或辨性较礼,附丽经师;或猎琐浮尖,依俦文苑。”^②“横绝英雄”实在不屑困游于三场二试、腐章屑律之间,故去彼取此,转而以杂述杂著见志。祝氏《野记小叙》也称:“坐志弗、勇弗,即条述新故,溷仍久益迷落,比暇,因慨然追忆胸臆,获之辄书大概,网一已漏九矣。”^③概言之,吴中文人对于志怪撰述的选择一定程度上也来源于个人科举失利的经历和对于应试性知识的反对,在事功、文章难以得到实现的情况之下,志于立言不朽的士人只能退而求其次,染指于志怪撰述,这亦是另一有效的施才骋艺和留名建志的途径和方式。志怪作品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人自我价值的认可和志向的舒张,这类文人的状态同时也体现着其身份的过渡和游离,即在仕隐二途之间无法作出坚定果敢的选择,同时怀着兼济和独善的理想,在撰述上也兼顾到言志之作和“从吾所喜乐”^④之志怪作品。

明中期是明代社会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过渡期和转折期,是明代社会走向全面衰落的起点,虽然各种社会矛盾还没有明显暴露,然整个社会充满着各种动荡的明潮暗流。身处其中的文人在阔大的宇宙和历史长河中,敏锐地感知着各种变化和衰败,却无法超越其所占据的特定时空点,他们并不能预计明朝的未来,充斥内心的是较之前代略显黯然平庸的失落感,众多新旧事物交替而来的良莠丛生的茫然失措感。超自然的怪力乱神成为人们心态的最好表达,胡应麟尝记:“宋有国二百年耳,野处宦达,南渡其时仅仅百载余,而怪力乱神纷然,若是去庄列之夷坚几何哉?余生肃皇帝季世,济承平,今马齿半百,奇衰诡异事,自生平未一睹焉,则传之耳者,率诞妄足推矣。”^⑤宋南渡的百余年,怪力乱神纷然,而胡氏生承平之季世,则无睹奇诡异事。明中期,语怪、志怪之作迭出,文人才士奢谈神鬼怪妖和奇闻轶事,这些谈论、记载的内容、方式和纷然沸扬的谈论风潮征兆出当时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弥漫着一种神秘、灵异和混沌的气候,也体现出谈论者的一种幻灭、无知、畏惧感,这与明中期全面酝酿变革的社会文化环境正好是契合的。政治、经济、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处在亟待变革以求发展的局势下,爆发出来种种关于复杂现象的预测、想象和解释,佛道思想在中晚明也异常活跃,人们甚至将思维伸向了不可知的有神论体系之中,借助神灵、宗教等一切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将事物的发生发展归为偶然、巧合和反常的非决定论里。这是社会历史文化在前进过程中尤其是变革初期所表现出来的失重感和无助感,从这一点来说,“自然流露”式的谈论、记载是志怪作品迭出的一个合理解释,也可看作是对隐约动荡的社会前进方向和方法的一种探索尝试。

(作者通讯地址:徐慧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100048)

(责任编辑 晓 文)

① [明]祝允明:《怀星堂集》卷25《西洋朝贡典录序》。

② [明]祝允明:《怀星堂集》卷25《西洋朝贡典录序》。

③ [明]祝允明:《野记·野记小叙》。

④ [明]祝允明:《祝子志怪录·自序》。

⑤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104《读夷坚志五则》。